



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



顾学稼 林蔚 伍宗华 编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前 言

1994年5月23—27日，国内各地包括香港地区以及国外的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的一些学者聚集在四川大学，举行了有关中国教会大学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中心议题为“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化”。

解放前，中国曾经存在过十余所教会大学，它们曾是旧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经过1952年的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这些学校已不复存在，其有关系科分别成为其他高等学校的一部分，其教师也作了相应的调动。这些学校的历史档案则分别被保存在各地档案馆和有关学校内。

由于这些教会大学和国外的教会曾有过很密切的关系，并在国外设有董事会，所以与学校有关的部分档案一直保存在国外。国外的一些学者较早对这些档案发生兴趣，并进行过不少的研究工作。到目前为止，差不多每一所旧中国的教会大学都已经有了西方学者撰写的公开出版的校史。美国拉特格斯大学的杰西·卢茨教授在1971年出版的《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一书中还曾对中国教会大学的总的发展历史作过较全面的叙述。这一著作已由杭州大学曾钜生教授译成中文，并在1988年正式出版。

中国学者对各教会大学的档案的较系统的研究大致开始于八十年代中期。为了交流研究成果并讨论一些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中外学者曾在国外、香港地区和国内各地举办过多次学术讨论会。例如1991年春在美国耶鲁大学和1993年冬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过的有关专题学术讨论会。在国内举办的有关教会大学史的最早的一次会议是1988年春在四川大学召开的。这虽然只是一次预备会

议，但却起到了联系国内外研究教会大学史的学者的作用。参加这次会议的除有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苏州大学张梦白教授、杭州大学曾钜生教授、北京大学张寄谦教授等多位学者外，当时正执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林蔚教授（Arthur Waldron）也不远万里前来参加。

1989年夏，华中师范大学举行的教会大学史学术讨论会应是在国内举行的第一次盛会，有多位中外学者参加会议，并提交了一批论文。会后出版了由章开沅、林蔚二位教授任主编的论文集。1991年许多学者又在南京师范大学再度聚会，交流科研成果，进行学术讨论。所以，1994年在四川大学举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是在国内召开的第三次盛会。

会议得到了四川大学历史系和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人力物力上的支持。有来自国内各地及香港地区和国外的多位学者参加（与会者名单见本书附录）。还有不少原定要参加的学者，由于各种原因，未能赶来参加，但他们也专门为此次学术讨论会撰写了论文。这些论文就中国各教会大学的许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评析，有些论文中运用和刊载了不少珍贵的史料。与会学者本着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的精神，热烈地参加了讨论。为了让对教会大学史感兴趣的读者分享这些研究成果，我们特将此次会议的部分论文汇集成册。有些学者提出的科研成果系准备出版的专著中的某些章节，还有的学者提出的论文篇幅较大，不是这本论文集所能容纳的，只得割爱了。为了尊重各位论文作者的学术观点，我们在编辑论文集的过程中，未对论文作任何修改和增删。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本书在付印前特邀请四川大学哲学系张绍英教授对全书作了审定。对此，我们表示十分感谢！

顾学稼

序 言

● 林 震 ●

1994年5月23—27日在四川大学举行的《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化学术讨论会》，在若干方面都标志着重大的前进。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或许是它清楚地表明了饶有成果的对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可以成为了解现代中国许多重大问题的途径之一。同时，它显示了自1989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和1991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有关教会大学史的学术讨论会以来，学术界对这个领域的兴趣有了引人注目的增长以及研究工作的发展。

不仅从事于这一项目研究的学者人数增加了，可供使用的资料的数量也增多了，更重要的是史学研究本身在水平上的提高。对教会大学史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越过了其初创和探索阶段，而进入了学术上的成熟阶段。

这本文集所收的论文足以说明上述事实。没有哪一篇论文属于简单地介绍和概述。每一篇论文都是对某一特定时期或地区、或专门课题的非常具体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中国基督教教育早年起源的论文，关于学校组织管理等方面的专题论文，也有关于重要教育家或某一学院的论文。同样地，我们还可以找到有关教会大学的影响的论文，不论是把教会大学作为现代教育的范例、或某种西方知识的传播者、或是某些杰出的中国人才的培育基地，这些人才中，有些人继续从事于促进教育发展的工作，有

些人则在教育以外的领域取得成就。此外，这些论文是剖析性的，并在对教会大学的作用的估价方面持客观态度。

学术研究方面的此种发展，使中国学者本身和那些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人，以及对那些其主要兴趣集中于中国研究的外国人士，都有理由感到极大的满足。在这里所提出的论文，其意义之重大，已大大超出最初所提出的“教会大学”这一课题。

从根本上说，这些论文所提出的问题，不论是直接地或间接地，不论是从这一观点或另一观点，实际上所论述的都是有关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问题。对于任何国家或民族，文化都是一个中心的、关键的问题。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来说，也是如此。文化是不能用某种固定的数量来衡量的。从西方的语源学来看，文化一词出自拉丁语；其意义是“Cultivate”，即培育。形象地说，即是对幼小植物的照料。这个词的起源与汉语中“教育”这个词中的“育”（即滋养、孕育）并无不同。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世代以后，一个民族的文化会不断发展和变更，而且这个过程在教育领域中的进行或许是最为有力的。

孔夫子认为教育所传授的内容是不变的，他说，“我传播，但不创新”（“述而不作”）。可是，这从来也不是一个完全准确的评价，甚至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也并非如此。这肯定也不是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直至现在的中国教育界的情况。因为这个时期教育的特点是在所传播的知识中，不断地有创新和变革。大量的新的知识来自西方，它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入中国，而中国要不失去它作为世界主要国家的地位，就必须使这些新的知识适用于中国。

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对教育进行实验的时期。由科举制度所维持的关于知识的单一的标准，被关于知识的许多不同的观念所取代。这些知识是实用的？还是古典的？是外国的？还是民族的？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进程，在教会大学里，最重要的是外国人和中国人一道工作，并且有了一项新的创造——很快出现了一个既是

现代化的，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计划。与此有关联的是创立了一系列的教育团体，外国人和中国人作为同僚，在一项共同的事业中，一起生活和工作。

如果说任何一项此类事业都是百分之一百地成功的话，那会是一个错误。西方的和基督教的课程最初曾把中国的学问排挤到一边。然而，正如五四运动所表明的那样，缺乏对中国传统的尊重，决非教会大学中所特有的问题。在教会大学中共同工作的中外人士的人际关系，也并不总是融洽的，在工薪和地位上，甚至在那些学历与资格相等的人士之间，有时其待遇也有极大的差别。这些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的更为广泛的困境。中国在多方面取得了积极的发展，但它所面临的困难，不论是内部的，或者在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都是巨大的。结果，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教会大学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事项。许多教会大学的学生参加了“民族主义的”运动，而这些运动往往又力图改变教会大学。

然而，学校的潜在力量，甚至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仍然非常强大。它首先反映在学校中的中国教职员对事业的忠诚方面。在战后时期，这些学校的进一步发展的计划已在进行之中。在西方，一些知名的大学，如牛津、哈佛、索旁等原来都建立在为宗教目标服务的基础之上，但最后，它们组织结构的发展都远远超出了最初的目标。同样的进程很可能也在中国发生。例如，燕京大学就是如此。

到了本世纪四十年代，至少某些教会大学的特色，由于它们去除了狭隘的偏见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并且已经不那么带有“外国的”印迹了。许多教会大学里设置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并且在中国文化的研究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哈佛—燕京学社和华西协合大学的情况就是如此。与此同时，“西学”或西方的知识，已经在中国本土化了，并且开始在值得一提的中西方文化的溶合

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约在四十年前，教会大学在中国大陆已不复存在，但是它们所提出的问题和它们有助于去满足的需要，并未消失。它们的经验虽曾一度被认为与现代中国的需要并无关系，但实际上却具有非常重大的实际意义，而且其历史，特别是在文化的变革方面，具有内在的与比较意义上的巨大影响。

由于上述诸点，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化学术讨论会所提出的论文，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们不仅在对教会大学历史的研究上，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在对中国现代不断的变革与发展的历史的了解上，都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1994年12月21日作于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秦耕 译)

●目 录●

前言

序

教会大学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政治 章开沅 (1)

近代教会学校教育与中国教育制度变革 刘鉴唐 (15)

迈向现代化的高等教育发展轨迹

——对旧中国教会大学学校管理运行机制

的初步探索 高时良 (51)

教会女子大学与中国女子教育的近代化 何晓夏 (64)

洋务运动与教会学校的发展 史静寰 (75)

论教会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早期现代化的促进 黄新宪 (84)

简论十九世纪末教会教育的发展 姬虹 (101)

西学·西教·近代化

——对教会大学在中国及相关问题的思索

..... 孙竞昊 (109)

从中国教会大学的人才培养看其历史的客观作用

..... 李湘敏 谢必震 (120)

教会大学建筑

——中国传统古典建筑复兴的起点 董黎 (132)

学战：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 罗志田 (148)

论我国教会大学的历史特点与社会评价问题 伍宗华 (174)

教会学校与近代天津教育 杜文平 (189)

清季民国时期四川基督教教育事业之评述

..... 秦和平 (205)

论基督教在成都地区的传播

附件：彭县白鹿乡天主教教会学校考述

..... 冯慧珠 (219)

美国基督教高等教育的发展 戴维·哈勒尔 (233)

林乐知与中西书院

——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历史侧影

..... 陈英吴 (241)

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生的历史分析

..... 包德威 陶飞亚 (250)

岭南大学与中国现代化 吴梓明 (268)

九·一八事件中的北平辅仁大学 吴小新 (286)

先父前金陵大学理学院院长魏学仁博士年表

..... 魏白蒂 (295)

华西协合大学医牙学院述评 姚波 刘军平 (310)

华西协合大学的收回教育权运动 顾学稼 (327)

附录

论文作者简历..... (343)

1994 年《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化学术讨论会》

出席会议代表名单..... (347)

教会大学与二十世纪 二十年代的中国政治

●章开沅●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直、皖之间，江、浙之间，直、奉之间，乃至蒋、冯、阎等各个新老武力集团之间，战争连绵不绝。还有五卅运动、济南事件、国共由合作到分裂，国民革命本身是风云变幻、波涛迭起。但是透过复杂纷繁的历史现象，仍然可以发现这十年的主旋律乃是民族主义。正如当年曾经流行一时的口号式歌曲所呼唤的那样：“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军阀之所以必除，正因为它是列强的走狗，而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奋斗目标。不仅国共两党、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就连各派军阀及其依附政客，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这一历史主流的影响。

本文试图把教会大学置于这一历史主流之中加以考察，着重探讨它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演变、演变的原因与历史经验。

(一)

二十年代的序幕，可以认为是由“五四”揭开的。“五四”无论是作为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还是作为标榜科学、民主与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都必然要冲击到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而来的基

督教，所以反宗教，特别是反基督教的思潮很快就蔓延全国。1922年4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不顾中国社会舆论的反对，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大会，立即促使这股反基督教潮流成为更广泛也更具组织性的群众运动。

早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召开前一个月，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学生已经着手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并于1922年3月9日发表《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3月20日，北京学界正式成立“非宗教大同盟”，随后并在上海、汉口、天津、长沙、成都等地设立分会。4月9日，即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的最后一天，“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大学召开有2000多人参加的讲演大会，强调必须消灭一切宗教以培养科学精神，“使四万万同胞从迷信中解放出来，向新的、民主的、自由的社会前进。”⁽¹⁾6月，“非宗教大同盟”出版《非宗教论丛书》，收有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吴虞、周太玄、朱执信、肖子升、罗章龙、李璜等人的31篇文章。这说明许多“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已经成为非宗教运动的倡导者。

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民族主义情绪更趋高涨，反基督教运动带有更为鲜明的反帝色彩。由于国共已经实现合作，两党人士都积极加以倡导推动，反基督教运动的组织性明显加强，并且衍生出收回教育主权运动，教会大学遂成为直接遭受抨击的主要目标。

先是在1922年，蔡元培发表的《教育独立主义》，主张教育与宗教分离，即已引起热烈反应。1923年，“少年中国学会”更明确提倡民族主义教育，反对宗教团体开办学校。余家菊首先提出“收回教育权”口号。⁽²⁾并且很快传遍全国。1924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次年会通过决议，要求政府制订学校注册条例，凡外人借学校实行侵略，一经调查属实，应即勒令停办。同年10月，“全国各省教育联合会”第10届年会，决议要求完全取缔外人在

中国办理教育事业。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以后，空前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推动政府不得不以政策法规保证收回教育主权。因此，就在这年11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外人在华设立学校认可办法》，对教会学校申请立案注册做出具体规定，包括：中国人参加学校行政领导；取消原有关于宗教课必修与宗教仪式一律参加的规定；平等对待中外教师；办学宗旨应属于教育而非宗教福音等。⁽³⁾不过，由于全国尚处于分裂状态，以及北京政局本身的混乱，这一部令并未得到认真贯彻。

1926年11月，广州国民政府亦曾颁布适用于外国教会开办的私立学校注册条例。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全国政令渐趋统一，收回教育主权遂正式提上议事日程。1928年，教育部重新颁布经过修订的注册规则，除坚持必须由中国人管理学校以外，特别强调私立学校不得将宗教列为必修课程，不得在课堂宣传宗教，亦不得强迫学生参加任何宗教活动。⁽⁴⁾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国民党对于包括教会大学在内的各类学校控制的不断加强，包括：普遍实行总理纪念周、党义课（三民主义）为必修课，军训必不可少等等。

教会学校遭到反对，除了受客观形势影响以外，当然还有其内在的原因。孟禄博士（Dr. Monroe）经过调查研究，曾将这些主客观因素归结如下：

1. 教会学校或多或少与中国当前社会运动脱节。
2. 中国教育当局害怕外国学校体系可能成为他们无法控制的“专擅主权”（*imperium in imperio*）。
3. 理性主义新思潮的发展。
4. 基督教精神与通商口岸“基督教文明”⁽⁵⁾之间的反差。
5. 国民革命反对不平等教育及不公平待遇，基督教教育常被等同于帝国主义。
6. 教会场所常被视为享有特权与保护的租界。

7. 中国教育界对宗教自由的见解迥然不同于基督教教育家。
8. 中国人担任（学校）重要职务的屡遭拒绝所引起的反感。
9. 对盎格鲁·萨克逊（Anglo-Saxon）“主宰一切”（Masterfulness）的愤恨。⁽⁶⁾

孟禄的分析虽不周延，但大体上还属客观事实。教会大学与其他教会学校一样，正面临着严峻挑战与迅速回应。

（二）

山雨欲来风满楼。原金陵大学农经系卜凯教授的夫人、著名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当时曾对1927年前夜南京外国教会人士的心境作过如实报导：“1926年秋天，我们已经悬念国民革命军何时将到达南京。他们从广州出发的北伐已经取得成功，并且在长江边的武汉努力建立自己的中心，准备继续进军下游。我们之中那些在牯岭避暑的人员，被卷入自湖南和汉口汹涌而至的难民潮流，——人们害怕战争与围困的危急，于是跑进安全口岸。我们渴望得到国民革命的消息，急于了解他们是真正的爱国的理想主义，或者无非是另一批黥武主义者。很难弄清全部实情。有很好的报告说他们献身于自己的目标，希望解放工人阶级，根除年深日久的性别、阶级、民族之间的不平等。随之而来的流言是（他们）仇视宗教，特别憎恶外国人控制的学校和医院，已出现若干排外事件，最糟糕的是俄国过激派已出现于他们之中。……正是在这种等待与困惑的心境下，我们栖身家中，并且开始了学校、医院与宣传方面的秋季工作”。⁽⁷⁾

要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就是1927年3月24、25日的“南京事件”。进城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士兵与下属群众在排外情绪驱使下，抢劫、焚烧外国教堂、教会学校乃至伤害外籍人士，享有很高声望的金陵大学副校长怀恩（Dr. J. E William）即在住宅被劫时不幸身亡。教会学校除金女大外，几乎无一幸免洗劫，外

籍传教士与教员从家庭到随身财物全被抢走。其后果便是外籍人员被迫全部撤退，先到上海，继而分为三路：一部分回国，一部分去日本，一部分去朝鲜。

尽管战争连绵与非基督教运动不断给以冲击，教会大学在二十年代总的趋势仍是持续发展。1927年“南京事件”及其他地区的类似情况，一度曾使教会大学学生数量锐减，上课亦不正常，乃至出现复旦大学分裂、信义大学流产等现象。但这种情况为时不久。1928年秋季以后，离校的外籍人员陆续归来。及至南京国民政府初步统一中国，教会大学又重新恢复了发展的势头。当然，发展的前提是大多数外国教会与外籍人员采取比较冷静与理智的态度，顺应中国民族主义的潮流。首先是遵守中国政府规定，履行注册手续，接受中国政府的教育方针、政策的指导，对教会大学内部进行大幅度的调适变革。

率先履行注册手续的是北方的燕京大学。早在1926年11月和1927年12月，该校即已先后分别向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申请立案并获批准。根据教育部规定，校长改由中国学者吴雷川担任；校董事会中国人占2/3以上，并有权决定一切教学、行政事务；宗教课程改为选修，宗教活动须在课堂外进行并改为自由参加。南方的岭南大学行动亦快，1927年1月校董事会即正式任命中国人钟荣光为校长。钟接任后发表公开声明：1. 尊重国民政府教育法令；2. 顺应民族运动潮流；3. 始终贯彻立校之初旨。⁽⁸⁾其他教会大学，除上海圣约翰大学外，均陆续遵照部令立案注册，成为中国私立大学之一部分。在这一重大转变过程中，绝大多数教会学校中外人士都能保持比较合作的和谐关系。例如，金陵大学在选举中国人陈裕光为校长后，该校在纽约的托事部（University of Nanking Board of Trustees）很快就发来电报，表示对选举陈裕光为校长的决定完全同意，并致以衷心的祝愿。⁽⁹⁾但圣约翰大学则因外籍校长持顽固态度而引起分裂，致使部分师生愤而离校，另办

光华大学。

在教会大学相继注册以后，南京政府将其与一般私立大学同等对待，并且逐步建立比较正常协调的关系。例如，金陵、岭南的农业改良曾得到政府的定期资助，燕京的乡村实验区也得到各级政府的支持，而政府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亦曾寻求教会与教会大学的合作等等。此后，教会大学加速了本土化过程，1923年—1924年教会大学的中外教职员人数大体相等，1932年中外之比改为2:1，1936年更改变为4:1，说明中国教职员人数正在不断增加。同时，教会大学在经济上对外国教会的依赖逐渐减少。如金陵大学经费来源，原来是美国创办人会担任65%，中国董事会担任35%；⁽¹⁰⁾以后则在学费收入与政府补助两方面逐年都有所增加，仅1934年为金大建筑图书馆政府一次即拨款10万元。⁽¹¹⁾与本土化同步进行的，则是教学水平的不断提高，如农、医、法、商、新闻、社会学、图书馆、电化教育等专业，一些教会大学都分别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从学校规模而言，教会大学在二十年代也有明显发展。1922年教会大学在校学生总数不过2,000人，1926年增加到3,520人。⁽¹²⁾到1936年，教会大学在校学生总数已达7,000人，比10年前增加一倍，为全国高等学校总数的12%。⁽¹³⁾根据1937年统计，在已毕业的10,000个教会大学学生中，3,500余人从事教育（其中2/3执教于教会学校），500余人从事宗教与社会工作，100余人任牧师，近700人从事医务工作，300余人以法律为业，近900人服务于公用事业，只有少数人经商。1936年—1937年，有1,100余人从事进一步研究（包括研究生），其中约300人留学海外。⁽¹⁴⁾

在1931年出版的《中国名人录》(Who is Who in China)所收录的959位名人中，曾在教会大学受过教育者157人，占16%以上。在这157人中，从事教育者37人，党政工作者48人，技

术专业工作者（包括农业、建筑、艺术、新闻出版、工程、医务、图书馆、科学家、作家、乡村实验等方面）72人。原来教会大学仅以英语教学见长，二十年以后，教会大学为适应本土化要求，又加强了中国语文与中国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如燕京的哈佛燕京学社、金陵的中国文化研究所等。仅以白话文作家而言，即有冰心、徐志摩、许地山、熊佛西、杨刚等一批著名人士毕业或曾肄业于教会大学。⁽¹⁵⁾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教会大学对于中国现代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与此相关的则是教会人士（其中不少曾是教会大学学生）在中国社会乃至政治层面的影响逐渐增强。1929年，中国青年会（YMCA）余日章宣布，已有YMCA的150位前干事在政府机关担任要职。冯玉祥在北京，张学良在东北，都曾与YMCA保持密切的关系。及至1938年初，YMCA国际委员会报告，YMCA前干事在中国政府中担任各类要职者已增至214人。所以，Rachel Brooks的一部书稿，即命名为《中国的YMCA政府》。

（三）

二十年代尽管民族情绪高涨，很长一段时间战争连绵，动荡不安，但毕竟没有重演“庚子之役”的大悲剧。这固然有其特定的国际背景，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相互矛盾重重，其国内经济危机也日趋严重，没有可能结成新的“八国联军”；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国社会与教会人士两方面的进步，以及相互宽容心理的增强。

从中国社会的进步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非宗教、非基督教运动的倡导者，大多是受过新式高等教育的知识精英。尽管他们往往将基督教混同于帝国主义，批判夹杂情绪化的民族主义，难免有流于片面、偏颇乃至武断之处，但主要还是用理性主义批判宗教迷信，目的在于促进科学、民主，

并非倡导以盲目暴力排外。同时，即使在非基督教运动极为高涨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知识分子，以比较冷静客观的态度对待宗教，并且敢于公开倡导正确处理民族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基督徒如简又文等发表《对于非宗教运动宣言》（1922年4月10日），从十个方面进行反批评，为基督教存在的合理性辩护。非基督徒如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等5人公开声明：“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类的信仰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¹⁷⁾另一学者常乃德说得更为爽直：“英国、美国是基督教国，但他们的科学进步，比非基督教的中国，究竟谁好谁坏？”⁽¹⁸⁾梁启超也认为：“宗教为人类社会有益且必要的物事，所以我自己彻头彻尾承认自己是非宗教者。”⁽¹⁹⁾这种反潮流的勇气是值得钦佩的，他们虽属少数，无力阻挡潮流，但至少从舆论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反基督教的狂热情绪，增强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理性思考。

第二，从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尽管在不同程度上顺应了反基督教运动所体现的民族主义潮流，但其具体运作只限于收回教育主权，并没有颁布任何压制或镇压宗教的过激法令，更没有如同晚清政府顽固派那样对义和团的盲目排外暴动煽风点火。特别是南京政府，由于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从孙中山到孙科，到蒋介石夫妇，乃至孔祥熙、宋子文等，本身就是基督徒，对基督教的历史与现状都比较理解。所以，他们并没有真正站在非基督教运动一边。他们对于教会大学的态度，无非是维护教育主权，坚持这些学校必须遵照政府规定，依法立案注册。而在教会大学注册以后，即视为中国私立大学之一部分，并根据社会的紧迫需要，有选择地支持其某些优势专业的发展，以发挥教会大学的积极作用。当然，政府与教会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这就是党化教育与